

北京大学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周年论集

赵存生 陈占安 主 编
王 东 夏文斌 副主编



北京大学 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754
Z296:1

北京大学纪念 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论集

主 编 赵存生 陈占安
副主编 王 东 夏文斌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论集/赵存生,陈占安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ISBN 7-301-07184-1

I. 北… II. ①赵…②陈… III. 毛泽东(1893~1976)-纪念文集
IV. A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492 号

书 名: 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论集

著作责任者: 赵存生 陈占安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184-1/D·08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1.375 印张 325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在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理论

研讨会上的讲话…………… 许智宏(1)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开创者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张启华(5)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沙健孙(2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黄楠森(38)

毛泽东倡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

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梁 柱(44)

学习和坚持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赵存生(59)

大力弘扬和努力实现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曹长盛(63)

深刻理解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思想内涵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陈占安(75)

伟大的开创者

——对毛泽东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 李士坤(9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起点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新探…………… 王 东 彭新莲(105)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及其转变过程…………… 杨 河(110)

毛泽东晚年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理解与思考…………… 郭建宁(122)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论毛泽东的文化观…………… 夏文斌(135)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坚持

“两个务必”的思想	全 华(148)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理论创新的世界视野	康沛竹(161)
党的几代领导核心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之演进	白雪秋(179)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哲学“对子”的再解读	黄小寒(189)
文化融合视角中的马克思主义	
——论毛泽东的本土化战略	魏 波(201)
从毛泽东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看中国现代化建设	
——兼从 2003 年春之 SARS 疫情谈起	史春风(212)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	田改伟(225)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宇文利(235)
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探析	孟志中(250)
毛泽东和过渡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周连顺(264)
服务人民,综合创新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李海春(275)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	侯肖林(287)
论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	王建永(299)
毛泽东生平、思想文献史料学研究述论	张注洪(310)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海外研究述评	成 龙(326)

附 录

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理论

研讨会综述	战 难(344)
-------------	----------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

做法和体会	战 难(347)
-------------	----------

后 记	(358)
-----------	-------

在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 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许智宏

(2003 年 12 月 5 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理论研讨会，纪念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当前，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社会主义中国经过 54 年的建设与发展，彻底改变了备受欺凌压迫的落后面貌，政通人和，经济腾飞，文化繁荣，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此时此刻，我们对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更加充满感激与敬意，对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而进行的伟大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而建立的开创性历史功勋更加充满感激与敬意！

毛泽东同志是在 20 世纪举足轻重的世界伟人。他的革命与建设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不仅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他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

曲折,都为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与借鉴,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党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成为我们沿着正确道路阔步前进的重要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过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不仅在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而且及时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历史地位,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全面、正确、科学地理解和把握,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同志做出的评价是英明正确、深得人心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毛泽东同志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所做出的毕生努力和重大贡献将永垂青史;他晚年的失误,并不能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也无损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评价。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将为世代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与爱戴!

毛泽东同志曾与北京大学多次发生过密切联系。特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青年毛泽东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是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飞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在北京大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这段经历有过多次深情的回忆。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指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关心北大的进步与发展,多次与北大的学者和学生座谈、交流,给学生写信,应约为北大题写校名,甚至连学生参加国庆游行淋了雨,都亲自指示食堂要提前烧好姜糖水……人民领袖与著名学府精神互通、情谊相系,是北大历史上

独具魅力的重要篇章。

在 21 世纪的新形势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说过,正是因为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多年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已经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当前,全党正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在学习贯彻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特征,也要全面把握它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是毛泽东同志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具有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光荣传统。近年来,我校组织知名教授为本科生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现在正积极推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努力使当代青年学子了解党的历史，接受党的理论，拥护党的领导，加入党的组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党的教导下正成长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这说明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永葆青春和活力。正在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的北京大学，将以对党、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努力培养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力争为实现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光辉图景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开创者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张启华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第一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艰难征程的起步阶段，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转折时期，那是一个没有充分实践因而没有任何经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毛泽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艰辛探索，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在挫折与磨难的洗礼下，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这笔珍贵的思想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第二点，“开创”者，说前人所未说，做前人所未做，开前人所未有之事业谓也。所以从方法论讲，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看他没说过、没做过什么，而是看他在当时历史提供的条件下，说了哪些他的前人未说之话、做了哪些他的前人未做之事，又对今天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东西——这应该就是他的开创性贡献。

以此为原则，下面从三方面对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开创者的地位加以说明：一、突破苏联模式；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创举；三、怎样看待他的失误。

一、突破苏联模式

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摆脱苏联模式,找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有人批评这是教条主义。这里用得着我们开头讲的,要看历史条件:当时除了与苏友好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可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其实,毛泽东恰恰是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因循守旧、照搬书本与他格格不入,早年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的精辟分析,更鲜明显示出他思想的显著特点——在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强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所以,当他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紧接着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风波又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之后,就果断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用他当时的话说,苏共二十大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指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全照苏联公式。他说:揭了盖子的好处就是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每棵树长得不一样,各国也有不同情况;要讲个性,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走不通。他一再强调要接受我党历史上的教训,反对用教条主义方法学苏联经验。他说,以前没经验,只好模仿苏联,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初步实践,又有苏联的经验教训,应该强调从国情出发,强调创造性,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但这条道路是什么,没有现成答案,只有靠实践探索。于是八大前后,毛泽东就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 1956 年 4 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

十大关系》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此后,这种探索持续到毛泽东逝世。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创举

1.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延续至今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而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1) 人民民主专政的创造性在于,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维埃政权相比都有鲜明的特点——从文字表述看,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不仅有“专政”,而且有“民主”,并采用内容更为广泛的“人民”一词,这就准确表达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2) 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建设

的传统和经验。那时,毛泽东就充分肯定这种组织形式,明确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又能集中处理国事,……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①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最适宜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最能体现国家性质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来,他还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做些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等。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和现实条件创造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6年,毛泽东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善。5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独特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同我党亲密合作、团结战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模式,又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

(4) 毛泽东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苏共肃反扩大化的教训,现在看很清楚,是因为没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但那时没这样的认识,因为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理由是,既然消灭了剥削阶级,结束了阶级对抗,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所以人们不敢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这一理论错误不但造成苏联政治、经济等具体制度的僵化,而且当社会矛盾充分暴露时,领导人不能正确认识、处理,导致矛盾激化。而此时我国也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正发生闹事风波。毛泽东顺应时势需求深入思考这个现实问题,提出这样一个课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真没矛盾?如有,怎样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决？由此形成了系统理论。主要观点是：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他说，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这不对，不是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无论多么长远以后的未来，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他提倡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矛盾。《论十大关系》具体分析了带普遍意义的十大矛盾，提出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堪称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典范。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引发、主导、推动其他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为此，他提出六条标准作为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当然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只提出这六条抽象的政治标准是不够的，这些标准有可能被随意解释。没有从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上制定区分标准，从而缺少可具体操作和准确把握的政策界线，是造成以后大量混淆两类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当时提出六条标准是有重要意义的。第四，毛泽东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第五，毛泽东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应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了两类矛盾，即使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今天处理新时期的新矛盾有许多借鉴意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这一科学论断，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2. 提出过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

这些经济战略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总的主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提出的具体经济战略,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多次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人说毛泽东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这不符合事实。他曾几次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方针。民主革命时期他提出,一旦建立起新中国,就要着手经济建设。建国初期,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衰败经济,他在1950年6月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②,1951年2月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③的重要战略构想。从1952年9月以后,他多次提出要制定一条过渡时期总路线,紧接着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适时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社会主义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全面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年6月中共八大确定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及经济建设方针。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

①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和发展生产力。”^①反右结束后,毛泽东在1958年1月重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对于生产方面知识的学习,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要制定一整套适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此后一直到“文革”前,工作重心未受到大的冲击,即使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也没有完全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因此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按原计划进行,于1965年基本完成。总之,毛泽东几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及时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机把握得是好的。

(2) 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战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结合在一起,不应脱离,更不能对立。他在1952年建议党中央提出的以“一化三改”中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这一结合的最好说明。他不止一次地表明,“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②。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不仅避免了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而且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 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起初,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实践的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想法。在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应实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68、21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行相当长一个时期,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①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这个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显露后,毛泽东首先觉察并设法纠正,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在纠错中,毛泽东经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需要相当长一段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4) 与此相关,在反思错误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也有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并比斯大林有所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为后继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列宁就说:“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尽管列宁为实践所迫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其实质是恢复商品经济),但他认为这是短暂时期的策略原则,是一种退却,半年后就宣布退却已到终点。后来斯大林有所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并在有限范围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意义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经济仅限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被排除在外,价值规律也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与计划也是严格对立的。这种情况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已形成传统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是很不简单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完全否定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认为中国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要大发展,特别强调农村应当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多生产能交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不仅消费资料而且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作为商品。他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

① 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